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主编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中国近现代史论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近现代史论丛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论丛/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97-3384-4

I. ①中… II. ①福…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②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1049 号

中国近现代史论丛

主 编 /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责任校对 / 白桂祥 王洪强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384-4

定 价 / 128.00 元

印 张 / 38.25

字 数 / 64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福建师范大学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前 言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始设于 20 世纪 40 年代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时期，著名的《闽星日报》总编郑书祥在史地科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

1952 年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至 1966 年，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进入发展时期，学科团队先后聚集王文杰、陈壬生、郭舜平、范启龙、程镇芳、林庆元、陈矩生、王隐、黄起寮、孙里亭、王大同等一批学术造诣颇深、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在这一时期，学科建设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方向上有了显著提升，而且加强了对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于 1958 年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福建师范学院停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也随之中断。

1972 年福建师范学院复办，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1972 年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学科团队进一步壮大，上述各位与陈增辉、陈贞寿等老师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又有郑勉己、郑祖溪、林戩、林少玉、陈能南、陈孝华、黄国盛、王民、叶青等相继加盟，后来，又增添高峻、杨齐福、林平汉、温锐、刘慧宇等。现在学科团队成员大部分拥有博士学位，从而使学科建设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历经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1987 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点。2003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学科建设上新台阶，培养的学生在教育、科研及社会各部门深受好评。多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学府及研究机构继续深造。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团队教师获得多项国家、教育部、省级社科规划等课题，多项成果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福建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学科优势领域，如陈增辉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林庆元的洋务运动研究、福建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陈贞寿的中国海军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等成果出色，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影响较大。学科团队出版学术专著40多部，重要著作有《福建船政局史稿》、《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林则徐评传》、《洋务运动与近代科学技术》、《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沈葆楨传》、《沈葆楨未刊信稿考注》、《杨廷理传》、《黄叔瓚传》、《中英近代化比较研究》、《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百年风雨话香港》、《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图说中国海军史》、《孙中山与福建》、《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福建近代经济史》、《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1~6卷）》、《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科举政治》、《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巨变与重组的民国政治》、《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中华苏维埃史》、《中共闽西南白区组织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稿》、《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等。

回顾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发展历程，我们感谢曾经为之贡献智慧和才智的前辈，并将发扬他们的科学精神。未来五年内，本学科建设将以“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建设史研究”、福建历史与海西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等项目为重点，培养引进新一代骨干力量，推进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本论丛由福建师范大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所收各篇论文是本学科团队教师近年来撰写的论文，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有的尚未发表，反映了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新进展、新成果。

目 录

前 言	/ 1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	明 龙 / 1
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	黄国盛 / 8
福建辛亥风云	范启龙 / 28
北伐东路军在福建的胜利进军及其速胜的原因	陈能南 / 45
试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地方政府作为 ——以福建“营前模范农村”为例	陈孝华 / 56
福建事变初探	郑勉己 陈能南 / 66
“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之特征 ——以福建红卫兵组织为个案的分析	叶 青 / 78
清代的茶叶贸易与资本原始积累	程镇芳 / 91
清代闽台“三通”及其历史影响	黄国盛 / 102
五口通商前后福建茶叶贸易商路论略	程镇芳 / 118
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变化与发展的 趋势	黄国盛 / 128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 ——以 20 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温 锐 / 153
苏维埃时期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再探讨 ——兼论敌人、朋友、同盟者的转换与劳动者、公民、 主人的定位	温 锐 / 179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地财政划分制度	刘慧宇 / 189
论民国时期证券市场监管的行政作为	刘慧宇 / 200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治水实践回溯	高 峻 / 215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杨齐福 / 242
历史认识驱动系统论纲	
——兼论多角度研究历史	汪征鲁 / 255
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思考	汪征鲁 / 262
文化三性阐微	王玉华 / 280
福州民间文化与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林金水 / 289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杨齐福 / 308
从“手术刀”到“出头天”	
——台湾基督教史述论	林金水 / 322
船政前后学堂和我国近代科技队伍的产生	林庆元 / 34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文化变革述论	王 民 / 373
论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的向外开拓意识	陈孝华 / 386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福建传播的几个问题	王大同 / 395
福建永安抗日文化活动的特点与起落	郑勉己 / 408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心理探析	叶 青 / 418
裴荫森与福建船政局的重振及发展	
——兼与“洋务运动开始破产论”商榷	王 民 / 429
方伯谦案新探	陈贞寿 黄国盛 谢必震 / 439
严复“天演”进化论对近代西学的选择与汇释	王 民 / 447
严复政治思想的两个世界	王玉华 / 464
关于陈宝琛的几个问题	陈贞寿 / 476
章太炎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林庆元 / 489
清末民初恽毓鼎与梁启超关系述论	杨齐福 / 509
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	叶 青 / 526
林祥谦爱国主义思想初探	王大同 / 546
陈仪主闽期间功过述评	陈能南 / 556
1949年蒋介石三次入闽之考辨	陈孝华 / 566
试析1971年毛泽东南巡对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	高 峻 / 583
毛泽东清正廉洁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高 峻 / 592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

明 龙*

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这场起义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水平推向了顶峰。由于这场起义爆发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即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穷途末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打进了国门，中国面临着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给这场起义染上了一层斑斓驳杂的色彩，它既颁布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理想的空想色彩极浓的《天朝田亩制度》，将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发展到最高水平，又颁布了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它既敬拜上帝，以彻底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又在其礼制、上谕、天父诗里处处流露出非常传统的封建思想。由于这场起义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复杂的现象，因此，这场起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成为史学工作者异常关注的一个课题。

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成功，到底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益还是无益？下面来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在这场起义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相互矛盾的现象。不过，撇开这些纷纭复杂的现象从根本上来看，这场起义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

从参加这场起义的阶级来看，尽管参加这场起义的阶级、阶层十分复杂，但毫无疑问，这场起义的主力仍是农民。虽然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已经出

* 明龙系范启龙笔名。

现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契机。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仍旧是封建的，近代化还远未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资本主义也好，近代化也好，都还远未给中国农民阶级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带来冲击。一句话，中国当时的农民阶级依旧是封建的传统的农民。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他们的思想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统一于封建社会内，二者都是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农民在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每打出“平均”的旗号，起来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民心。这一点在《天朝田亩制度》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①这种平分土地的纲领，以及太平天国所要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②的理想社会，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旧式农民战争的纲领，是“平均”、“均平”——“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这一思想线索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的纲领，农民阶级根本无法把它在实际斗争中贯彻到底，其结果若不是农民战争遭受失败，就是农民政权的蜕化变质，成为封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很明显，从旧式的农民战争里是不可能产生近代化的内在冲动的。因为农民阶级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

除了农民这个主力之外，太平天国起义参加的阶级还有矿工、船夫、无业游民、市民等。这些阶级或阶层，在当时还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的成员，并不具备新的思想。纵观太平天国运动之始终，起决定性的、支配的作用的阶级是农民。

以上我们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农民的阶级属性探讨了这场起义同近代化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情况：

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阶级出身，一部分是贫苦农民，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人；一部分是下层失意的封建社会乡村知识分子，如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此外，还有部分帮会首领，如罗大纲等。在整个运动中属于支配地位的是前面两部分人。出身于贫苦农民的领导者，其思想我们已在前面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

^②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

面阐述过了。至于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封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传统教育，拿天王洪秀全来说，他“自幼即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①以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这种系统的封建教育，使封建的价值观在他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屡受挫折，很不得志，因而对封建的现政权产生了由怀疑、不满到反抗的意识，从而吸收了历代农民战争中的平均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义里貌似“平均”的“平等”思想。他们之所以接受“平等”思想，并非他们已掌握了近代社会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同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平均”思想相似的缘故。而且在实践当中，他们只是将“平等”思想作为号召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进行统治的手段，并未作为一种价值观来争取实现。这样，他们所提倡和号召的同他们所具体实行的内容，便有了天壤之别。洪秀全曾经宣扬“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②、“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等。^③从这些泛泛而谈的内容来看，太平天国似乎有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可是，到具体实行时则依然采用“称王称帝”的封建王权制度，父传子的王位世袭制度，区分上下尊卑的避讳制度，以及后妃式的多妻制等。天王在诏旨中明确指出“天下万郭帝无二”；^④确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⑥的原则；提倡“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⑦的观念。洪秀全带头搞一夫多妻，幼天王被俘后说：“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⑧天王还自称为“朕”，将办公的地方称“殿”，住宿的地方称“宫”。人与人之间因地位和职务不同，都规定了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丛刊本《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838页。

② 《原道醒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15页。

③ 《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16页。

④ 《贬妖穴为罪隶论》，见《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39页。

⑤ 《天父下凡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74页。

⑥ 《劝幼学诗》，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60页。

⑦ 《劝幼学诗》，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60页。

⑧ 《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855页。

各项专门的称呼。^①一般官兵的名字若与诸王名字相同，都得避讳改名。还规定了明确的等级制和特权制：如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依次递减至翼王五千岁。他们的王府规格不同，后妃数量不同，轿夫数量不同，连吃肉的定量也不同。这都是典型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作祟的结果。其繁杂琐碎的程度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个极其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矛盾现象，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从它的领导阶层来看，贫苦农民也好，封建的乡村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其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仍然是封建传统的。他们绝不可能离开实际而建立一个超出封建政权的新政权。因为在封建时代，从来没有存在过“农民政权”。

关于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天朝田亩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要造就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平均思想，是农民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模糊回忆以及他们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向往。它在太平天国前期部分地得到了贯彻执行，例如圣库制度、百工衙和诸匠营等。但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近代化也已有一定契机的情况下，这种对商品经济进行摧残的做法，显然是对近代化进程的一种反动。而且《天朝田亩制度》既规定给农民分配田地，而其中的圣库制度实际上又将农民已分得的地收益重新剥夺了回去，收归了“国有”。这种制度与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根本上是互相抵触的。农民为了取得土地才奋起参加起义，可是圣库制度却规定农民生产的产品除了其生活必需之外，一律须交归圣库。农民即使分得了土地，也没有多大的好处，甚至分得土地越多，农民吃亏越大。很明显，这种理想上同政策上存在的矛盾若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太平天国实际上无法贯彻执行《天朝田亩制度》。它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最终只是“照旧交粮纳税”。这样就又回到了封建的老路上面。

以上，我们已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领导阶级、政策等方面论述了这个政权的封建性，也就是说这场起义即使不失败，它也只能建立一个封建政权，不可能超过它。事实上，太平天国后期这个政权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完全封建化了。这种封建化的政权同近代化根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有关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作用，一些论者多引用

^① 《太平礼制》，《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256页。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加以说明。毫无疑问，《资政新篇》确是一个希望推进中国近代化、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可惜《资政新篇》却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它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它也就没有实现的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上，《资政新篇》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实践过。

既然太平天国这场旧式农民战争的结果只能建立一个封建政权，那么它对中国近代化有无积极意义，我们只要将它与清王朝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究竟了。

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近代历史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反对外来的侵略以实现民族的独立；反封建斗争以争取民主；改变贫穷落后以谋求国家的富强和进步，等等。但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都必须以近代化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其他问题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这是由当时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中国近代史开始之时，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要由这样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必须在经济上实现由小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工厂机器生产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完成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完成由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三种转变在正常情况下该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和实现的。而在中国，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近代史开始之时还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西方列强打进国门为契机的。所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不是靠资产阶级来推动，而是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在清王朝日趋衰落，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反复蒙受耻辱的刺激下，愤而起而主持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历史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经济一日千里地发展。此时的中国尽管封建制度已趋衰落，但从整体看来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清王朝对整个世界的形势一无所知，王朝上下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在此情况下，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衰败的清王朝已无法与之抗衡。战争的失败，促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成员幡然醒悟，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

张。可是，这种口号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得到什么回响，绝大部分人仍把鸦片战争的失败看作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他们依然夜郎自大，奢侈腐朽，得过且过。时间过去了20年，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再次丧师失地的时候，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才体会到必须实施林、魏提出的战略，开始搞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长技”，致力于近代工业。这时中国的近代化才真正开始起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的若干特点：

第一，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其动因并非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由对外部战争的一再失败所推动的。

第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其说是由于清王朝衰落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它还会主动地去推行近代化！

第三，中国近代化的阻力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天朝上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在作祟，不经过几次对外战争的惨败，不打破传统的惰性，近代化就不可能付诸实施。

第四，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才开始的，当时国内还没有现成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在开始的时候，是由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主持的。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由于外力的冲击，即战争的不断失败，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王朝本身已经非常腐朽和衰败。中国近代化起步的迟缓，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所致。太平天国如果取得最后胜利，在统一中国之后，毫无疑问地定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在这个封建王朝的身上，也同样地将要背负着阻碍近代化的“天朝上国”的沉重包袱。因为它与清王朝有着同样的封建传统的价值观。要让太平天国这个封建王朝去实施中国近代化，也非得同样地经过几次外力冲击不可。这样一来，由清王朝一部分封建官僚主持并已开始了的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势必就会中断或者延期。

从太平天国与清王朝这两个并存的封建政权“师夷长技”的程度来看，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都同样地使用过洋枪洋炮，所不同的是清政府已开始设立近代军事工厂，从事洋枪洋炮的制造。从使用到制造，这中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表明清王朝已开始着手实施近代化了。而太平天国则不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它设立过近代工厂的遗址、实物或

文字资料。但是，比清王朝胜过一筹的是，太平天国颁布了《资政新篇》。它看上去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文件，不过《资政新篇》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却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一句话，在太平天国运动里面并不具备实施近代化的条件。而且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实施过。因此，我们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对中国的近代化并不一定有利。但是，这场起义在客观上来看，对于清王朝实施近代化，倒是起了促进的作用。

原载于《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6期全文转载

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

·黄国盛

兴办近代海军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福建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法战争时期，福建海军经历了一个由创建、发展到衰败的过程。福建海军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同时，它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又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影响。

—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等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是为福建海军筹办的开始。“中国创办海军，起自马尾船政”^①。福建海军的创办成了近代中国海军的起点。

福建海军创建的原因何在？过去我们只强调它是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②实际上，清朝部分官吏创办新式海军的动机和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威胁。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像左宗棠这样比较开明的官僚。他们对世界形势已有所了解，认为清朝旧式水师名存实亡，致使西方列强群起轻视之心；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③。可

① 林献沂：《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第605页。

② 《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43页。

③ 《同治五年十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6、19页。

见，近代中国海军的兴办，一开始就包含了挽救民族危机的积极意义。当然，左宗棠兴办海军，同时也带有便于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观企图。他们刚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体会到洋枪洋炮的益处，为了稳固统治，迫切需要新建轮船水师，“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①。1877年初（光绪二年十二月），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为了尽快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就曾咨请福建船政大臣，由他率清军从福建泉州搭乘船政所造的“海镜”轮船，“开驾放洋对渡鸡笼淡水”^②。可以说，新式海军的创办，包含了对外抵御列强和对内镇压人民的双重目的。但从新式海军的特点和它后来起到的全部作用来看，前者是摆在首位的。

创办新式海军，绝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办海军的不乏其人，为什么唯独福建海军能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创者？这和当时福建海军创办的途径及所持的民族立场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福建海军以“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③把建立新式造船工业作为筹建海军的一项重要条件。

在兴办海军的过程中，发生了所谓造船与买船问题的尖锐对立。左宗棠向清朝当局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其时英人威妥玛、赫德有借新法自强之说，思藉购雇而专其利。美里登、有雅芝等亦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④在这里，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侵略分子唆使清政府“购雇”轮船的险恶用心。他认为，中国只有通过造船，“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其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使中国海军立于不败之地。^⑤

举办船政，左宗棠创议于前，沈葆楨规划于后。^⑥左宗棠在船政局设立后不久调任陕甘总督，他特意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楨“总理船政”。沈葆

①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7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档第7号：《光绪三年二月初七日京报》。

③ 《光绪五年六月初三日两江总督沈葆楨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16页。

④ 《同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10页。

⑤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6页。

⑥ 《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文煜等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94页。